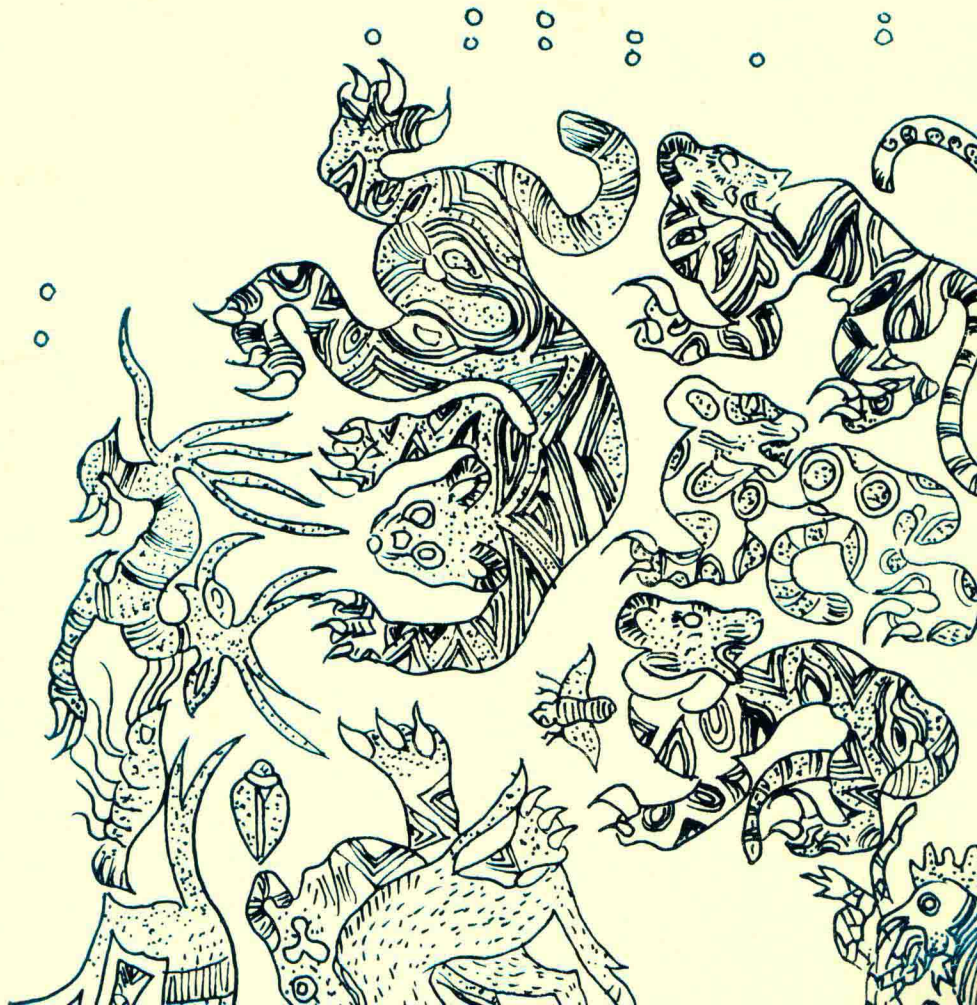


铜铸滇魂

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

Classical Copper Casting Culture in the Dian Kingdom — An Exhibition of Bronze Culture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Yunnan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编
侯宁彬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铜铸滇魂

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

Classical Copper Casting Culture in the Dian
Kingdom — An Exhibition of Bronze Culture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Yunnan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编
侯宁彬 主编

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铜铸滇魂: 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编.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604-4165-8

I. ①铜… II. ①秦…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
云南—战国时代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1790号

铜铸滇魂

——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

编 者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主 编 侯宁彬
责任编辑 郭学功 琚婕
装帧设计 雅昌设计中心·北京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西北大学内
电 话 (029) 88302621 88302590
邮政编码 710069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mm×635mm 1/8
印 张 29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04-4165-8
审 图 号 云S(2018)013号
定 价 360.00元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编委会

主 任 侯宁彬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斗 王润录 田 静 李红成 张 岩

武天新 杨延临 侯宁彬 侯宏庆 郭向东

学术顾问 马文斗 樊海涛

主 编 侯宁彬

副主编 郭向东 邵文斌

学术文章 蒋志龙 樊海涛

撰 文 樊海涛 平 力 张 涛

图 片 严钟义 邢 毅 樊海涛 李红成 杨成书 平 力 姚佳琳 陈 亮 赵 震

翻 译 张济琛 杨立盟 庞佳瑜

审 译 Shiona Airlie

执行编辑 张 涛 平 力

图片编辑 赵 震

校 对 邵文斌 樊海涛 平 力 王 锐 张 涛 姚佳琳 杨立盟(英文) 庞佳瑜(英文)

展览组织与实施

总 策 划 侯宁彬

项目总监 郭向东

项目负责 邵文斌

内容设计 樊海涛 平 力 张 涛

形式设计 崔大龙

图 片 邢 毅 严钟义 樊海涛 杨成书 平 力 姚佳琳 陈 亮

翻 译 张济琛 杨立盟 庞佳瑜

审 译 Shiona Airlie

展览组织 马生涛 郑 宁 等

目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序一 | 001 | 序一 |
| | Preface 1 | | Preface 1 |
| 003 | 序二 | 003 | 序二 |
| | Preface 2 | | Preface 2 |
| 005 | 近年来滇国考古的新发现 | 005 | 近年来滇国考古的新发现 |
| |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Recent Years | |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Recent Years |
| 011 | 东周至东汉时期的滇国 | 011 | 东周至东汉时期的滇国 |
| | Outline of the Dian Kingdom | | Outline of the Dian Kingdom |
| 021 | 前言 | 021 | 前言 |
| | Introduction | | Introduction |
| 023 | 第一部分 古国重光 | 023 | 第一部分 古国重光 |
| | The Dian Kingdom Rediscovered | | The Dian Kingdom Rediscovered |
| 037 | 第二部分 青铜铸史 | 037 | 第二部分 青铜铸史 |
| |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Dian Kingdom | |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Dian Kingdom |
| 197 | 第三部分 遗失之国 | 197 | 第三部分 遗失之国 |
| |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an Kingdom | |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an Kingdom |
| 218 | 大事年表 | 218 | 大事年表 |
| | Chronological Table | | Chronological Table |
| 220 | 主要参考文献 | 220 | 主要参考文献 |
| | References | | References |
| 222 | 附录：「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展览设计图 | 222 | 附录：「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展览设计图 |
| | Appendix: A Presentation of Classical Copper Casting Culture in the Dian Kingdom — An Exhibition of Bronze Culture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Yunnan | | Appendix: A Presentation of Classical Copper Casting Culture in the Dian Kingdom — An Exhibition of Bronze Culture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Yunnan |
| 226 | 后记 | 226 | 后记 |
| | Postscript | | Postscript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院。同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也是以秦始皇陵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经过近4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遗址陈列为主体、铜车马陈列为精华、整体风貌环境为烘托、临时展览为补充的相对系统的陈列展示体系。

30多年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了多项有影响的临时展览，拓展了作为世界遗产地的展示内容，现在基本形成了以秦文化主题展览为核心，同时举办世界文明系列展、东周时期地域文化系列展、秦帝国之路系列展、秦陵博物院系列成果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临时展览体系。自2014年策划“东周时期地域文化系列展”以来，先后举办了“萌芽·成长·融合——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南国楚宝 惊彩绝艳——楚文化展”“传承与谋变——三晋历史文化展”“泱泱大国——齐国历史文化展”“水乡泽国——东周时期吴越两国历史文化展”“寻巴——消失的古代巴国”“神秘王国——古中山国历史文化展”等展览。这些展览使观众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不仅能了解到秦中央集权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成就，还可以了解到东周时期中华大地上各地方区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面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两千多年前，云南的滇池沿岸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滇”的古老文明，她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就在司马迁将它载入史籍后不久，滇国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以及大量青铜器，揭开了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再次把这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群等多个重要滇文化遗址的陆续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滇国遗物，这个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代王国逐渐向世人

显露真容，古滇王国的光辉才重现于世。“滇”是青铜艺术的王国。滇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巧夺天工的冶铸技巧，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熔铸成一件件青铜艺术杰作，引领我们穿越时空，去探寻古滇盛景，触摸古滇之魂。

“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东周时期地域文化系列展”之一，也是2018年我院推出的又一重要展览。该展览为我院与云南省博物馆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精心筹备的首次以滇国文化为主题的原创展览，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云南滇国青铜历史文化和综合研究的成果。我们试图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寻觅神秘的滇国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探寻其历史之谜。一个好展览的生命不应随着展览的撤离而结束。我们与云南省博物馆合力出版的这本《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图录，将精美的120件（套）展品和相关研究成果记载下来，可以为滇文化的研究提供资料，也可以为亲临现场的观众留下长远回味，还可以为未能参观展览的观众提供一个了解滇文化的机会。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

侯宇彬

2018年6月

彩云之南，山高水碧，滇国故地，钟灵毓秀。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滇人在滇池东南岸建立了滇国，势力涵盖今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其创造的青铜文化迸发出中国西南边疆的文明之光。

“滇”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一个古代王国。它出现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至西汉为其全盛时期，西汉晚期走向衰落，逐渐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滇国尚未有自己成熟的文字系统，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古滇国的记载也是只言片语，其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历史岁月之中湮没了两千多年。直到1955年石寨山滇王族墓地的发现，才让古滇王国的光辉重现。其出土物品类之盛大、技艺之精湛、所展示的文明之高卓，令人震惊。滇文化遗物迄今已出土上万件，以青铜器为大宗，它们不同于中原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崇神、重礼的程式化、符号化，而是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滇国青铜器以生动细腻的写实手法著称，将两千多年前滇国社会的一幕幕场景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战争、祭祀、宴乐、狩猎、耕作、出行、动物活动等场景，都被滇国工匠们捕捉下来，铸成永恒的瞬间。可以说，滇人用青铜铸造了历史，铸就了滇国之魂！

云南与陕西虽相距千里，但自战国时起，滇、秦就有交集。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时期，秦国即开始经营西南边疆。秦孝文王时（前250—前247年），李冰“凿犍道”，即由青衣沿青衣江至犍道（今四川宜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致力于西南边疆的开拓，开五尺道。“五尺道”是在“犍道”的基础上开拓的从蜀至滇的道路。由犍道经朱提（今云南昭通），达味县（今云南曲靖），再转到滇池（今云南晋宁），因其穿行在崇山峻岭间，仅宽五尺，故名。犍道和五尺道联通秦与滇，使云南与内地的交流更加紧密。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被匈奴阻隔。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得知另一条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乃至西亚和欧洲的“蜀身毒道”。汉遣使求通时，在云南西部被“昆明人”所阻挠。于是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军，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中遂有“汉习楼船”之典故。如今正值昆明池重修再开之际，滇文化展到古都西安再续前缘。此次的“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选取了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最具特色的文物藏品，以及近年来云南考古的最新发现，主要是战国

至东汉时期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地出土的滇国文物。整个展出以青铜器为主，辅以漆器、金器、宝玉石等品类，这些文物浓缩了古滇国文明的精华，展现出两千多年前的古滇国的文化面貌。参展的 120 余件（套）文物中，仅一、二级藏品就有 58 件（套），其中石寨山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祭祀场面贮贝器等都是举世闻名的滇国瑰宝。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云南省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始终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今天，“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隆重举办，这是两馆合作交流、共同努力的成果，希望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最后，衷心祝愿“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取得圆满成功！

云南省博物馆馆长



2018 年 6 月

近年来滇国考古的新发现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rom the Dian Kingdom in Recent Years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蒋志龙

进入 21 世纪,云南在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墓地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深入

以往,我们对墓地的认识,通常只是在墓地被盗以后,进行抢救性清理的时候才有所了解,而且清理也只是针对被盗的区域,被盗墓者“牵着鼻子走”,走入了“被盗—清理—再被盗—再清理”的怪圈。如石寨山墓地,经过 1955—1960 年先后四次发掘之后,人们就很少“关注”这个墓地了。从 1991 年起,在云南刮起的“盗墓之风”也蔓延到石寨山。据当地村民说,最多时有成百上千人到墓地盗挖。1996 年的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最初的目的也只是想了解石寨山墓地是否还有墓葬,后来的清理演变成抢救性发掘,并且还出土了不少让世人为之震撼的新文物。之后,石寨山墓地的考古工作又沉寂了。类似的现象不仅在晋宁石寨山存在,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等墓地也存在,在云南其他地方肯定也还有。1992 年的江川李家山因被盗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因其重要发现还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1998 年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因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墓葬隐匿不报,并大肆疯狂盗掘,后来被当地村民举报才进行抢救性发掘,仅“滇文化”墓葬就达 800 余座,出土文物数万件,其中 M113 墓室被盗,在剩余的腰坑之中,发现大量保存完好的漆器,因此获得 1999 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墓地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通常做法就是在被盗区域开展清理,极少会主动摸一下整个墓地的墓葬分布情况。这种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无论对考古研究还是对整个墓地的保护,都是极不利的,但这是那个时候的“常态”。

2006 年,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下,玉溪市文物管理所对澄江金莲山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该墓地照例也是因为被盗而被发现的)。在清理过程中,有一些重要发现,特别是在墓葬中保存有大量的人骨,其奇特的人骨埋葬姿势引起了考古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在发掘过程中,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仍显不足,比如,针对大量出现的人骨,没有进行现场的人骨鉴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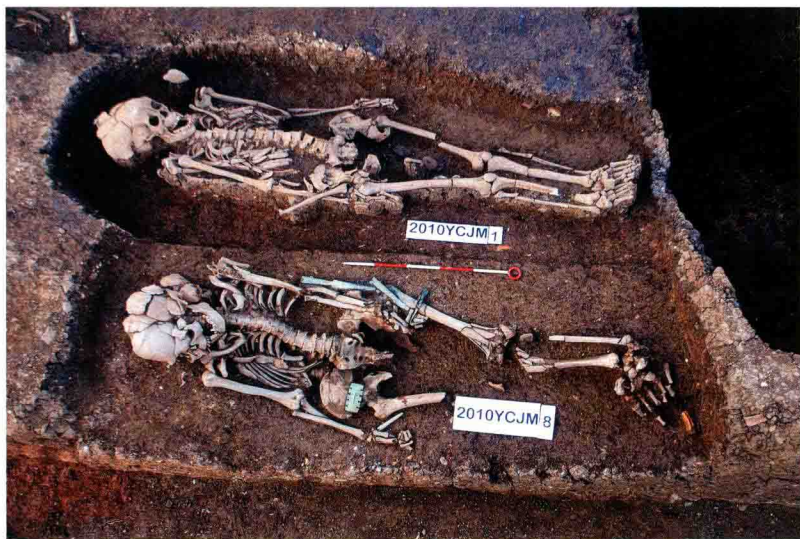


金莲山墓葬发掘航拍图

对一些葬式的判定也不到位等。考虑到该墓地十分重要，我们认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选择一个区域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了事，必须在发掘前对该墓地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古勘探工作。于是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聘请专业考古勘探公司，利用洛阳铲对整个金莲山墓地进行了系统勘探，也取得了很大收获。通过勘探，我们知道了整个金莲山墓地墓葬的分布范围，以及墓地的大致布局、疏密程度，为金莲山墓地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在云南的考古工作中属于“吃螃蟹”之举，当时面临行业内外的巨大压力，但我们觉得这一做法是对的，是符合云南实际情况的。

自此之后，云南又先后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等进行了系统勘探。在两个墓地的勘探中也都有一些新的重要收获——不仅摸清了墓地的墓葬分布范围、埋藏规律，而且还有一些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比如在石寨山墓地发现有围绕墓地的城墙，后来在石寨山山脚下还发现有类似城壕的遗迹；在李家山发现有被 M24 打破的时代更早的墓葬等。这些考古勘探工作，不仅为考古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而且为有关部门制订墓地的保护规划，以及在未来开展保护性展示都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做到心中有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摸清家底的基础工作，这也是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的要求来做的。

随后，在考古勘探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在金莲山山顶区域 2006 年发掘的南边部分进行发掘，了解墓葬的埋藏情况和文化面貌。在 600 平方米范围内清理了 265 座墓葬，墓葬分布的密集程度是我们之前所未曾预料到的，使我们对该墓地的了解更深一步。¹在这次发掘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墓葬的分布规律，了解墓葬特殊的葬式和葬俗，同时，也可以验证考古勘探的可靠性。针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我们聘请了专业的体质人类学专家现场对出土人骨一一进行鉴定。这样，使我们清理的每一座墓葬中埋葬了什么样的人，年龄多大，是男还是女都一清二楚。有了体质人类学的鉴定，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埋在墓坑中的人的信息。将这些人与他们的随葬品一一对比，我们发现：金莲山墓地的成年男性都随葬青铜兵器和圆形扣饰，女性则都随葬陶质的纺轮，



金莲山墓葬清理人骨

几乎没有例外。体质人类学的这一鉴定结果，对我们分析那些只见随葬品而不见人骨遗存的其他石寨山文化墓葬而言，具有指向性的意义，使一大批石寨山文化墓葬的墓主性别得到厘清。

在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的同时，我们还委托专家对人骨进行古病理的研究，分析导致这些人死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通过古病理分析，发现关节炎是当时引起人们死亡的重要病因。通过对部分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了解到金莲山人的饮食构成，分析结果表明：金莲山墓地的墓主肉食来源比较丰富，他们所摄入的植物类以C3类为主，达85.85%~94.87%，这类植物当为水稻。总之，从金莲山墓地出土的人骨的分析鉴定，使得我们对石寨山文化的“人”的认识大大地推进一步。我很赞同当时陪同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前来金莲山墓地检查工作的宋新潮副局长的一句话——金莲山最有价值的是这批人骨，我们不能亏待了这批“国宝”。

二、聚落遗址的探索

石寨山文化遗址一直是石寨山文化考古研究中的短板。

1990年，对玉溪刺桐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使石寨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出现了转机。该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同心圆纹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云南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50年代末，同心圆纹盘是滇池盆地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以来所形成的学界共识。刺桐关遗址中发现的与同心圆纹盘共存的圜底陶釜以及青铜器小件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骚动，思想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遗存的不同，但并未真正动摇人们对这类遗存年代的认识。

2005年，对昆明西山龙门天子庙遗址的发掘，标志着石寨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真正开始。在该遗址发掘的地层中，除发现大量的同心圆纹盘类遗存外，还发现了与这类遗存共存的圜底陶釜、有肩有段石铤、铜鱼钩和铜刀等遗物。最让人吃惊的是，在遗址中还发现有残断的石镯，这类石镯在形制和大小上与墓葬中出土的“玉镯”完全一样。遗址中出土的侈口旋纹罐残片更能直接跟

滇池盆地墓葬中的同类器物完全对应起来。

因此，我们认为，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应该属于青铜时代。可惜由于发掘面积的限制，我们未能发现包括房屋在内的遗迹现象（当时的发掘仅限于高海高速公路的占地范围，地势陡峻且十分狭窄），未能找到该文化的聚落，我们推测该遗址的聚落应该就在发掘区附近。

2006年，我们对晋宁区上蒜镇的小平山遗址进行了试掘。²在试掘中，我们首次发现了石寨山文化的半地穴式窝棚状的房屋。

2008年，在进行澄江金莲山墓地发掘的同时，我们一直在思考，金莲山墓地的主人生活的聚落在哪里？我们一边发掘，一边安排工作人员在附近区域寻找遗址的线索。当听说附近的学山上有同心圆纹盘时，我们立即前往调查，在该山上果然发现了同心圆纹盘的残片。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发现的就一定是聚落遗址。随后，委托金莲山墓地的勘探公司对学山进行了系统勘探，发现了大量类似灰坑类的遗迹现象。我们随即对其中的一处理藏较浅的灰坑进行试掘，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半地穴式房屋³，推测该房屋可能与金属冶炼有关。

2010年，我们对学山遗址申请了正式发掘。通过发掘，我们了解到学山遗址是一个保存完好的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⁴，其房屋形制既有半地穴式的，也有浅地穴式的，还有平面起建的，这些房屋的基础都是直接在基岩上开凿出来。房屋的排列整齐有序，所有的房屋都朝向一个方向，连接各房屋的道路清晰可见，连接村落与山下的道路亦保存完好。在部分大型房屋的一角埋葬有人骨，采用蹲肢葬，头顶压一块大石头的特殊现象在周边地区尚未发现。村落中发现的部分墓葬中出土有纺锤形的陶瓶，周身饰满戳印纹，其形制大小和纹饰风格与在通海海东贝丘遗址发现的一模一样（海东遗址的测年在距今4000年左右）。遗址的房屋和灰坑中还残留一些碳化稻谷和小麦等粮食作物。

2013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东川玉碑地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出房屋、灰坑、柱洞、活动面及瓮罐葬的遗迹，并出土陶器、青铜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矿石炼渣和碳化稻等遗物。发掘共清理房屋15座，灰坑49座及瓮罐葬6座。房屋均为圆形半地穴式和浅地穴式房屋，地穴深约0.1~1米，房屋地穴周围分布有柱洞，中心部位有一个较深的中心柱洞，柱洞旁有烧火痕迹，推测为火塘位置所在。房屋直径一般4米，较大者5米，屋内地面平整，屋面坚硬，部分房屋居住面边缘发现有凹槽及小坑，凹槽皆位于房屋东侧，推测其用途为汇集或者排泄雨季穴壁渗漏的雨水。地穴周围土质较为坚硬，部分坑泥用作房屋墙基，在地层及灰坑堆积中曾发现部分经过烘烤且质地坚硬的土块，推测其可能为已损坏的木骨泥墙残块。该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与滇池盆地的不同，不过附近的普车河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与滇池地区的相同。所以玉碑地遗址是否属于石寨山文化或者只是石寨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还是作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通海兴义贝丘遗址进行了发掘⁵，清理属于兴义二期的房屋18座、墓葬8座、瓮罐葬4座、灰坑2个、道路4条以及灰堆10个、沟2条等遗迹现象。其房屋种类丰富，既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式、干栏式以及亭棚式的房屋。圆形半地穴式房屋中央的柱洞呈方形分布，方形柱洞中央多为灶堆，沿房屋内地穴边缘有密集的小柱洞，应为木骨泥墙。地面式房屋多为方形，在地面有较浅的基槽，基槽内有木骨泥墙。圆形房屋的中央多有火塘，而方形房屋却没有火塘，发掘者认为这些房屋可能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

在该遗址的海东类型遗存中，在一个灰坑中（H4）发现一具人骨，四肢卷曲于胸部，人骨



上西河遗址发现的房屋航拍图



上西河遗址早期的陶器

上方压有4块较大的石块，其余的11座墓葬，除M6、M7、M8和M12—M15均为曲肢葬外，M9、M10、M11、M16和M20人骨保存不完整，无法推测葬式，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固定信仰的族群。在人骨上方压有石块的现象与澄江学山遗址发现的相同。

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晋宁上西河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距地表3米以下，发现了汉代的堆积，汉代堆积的下面发现了时代更早的石寨山文化的聚落。汉代堆积主要为水井，在约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13眼水井。石寨山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屋和灰坑等堆积，房屋有半地穴式和干栏式房屋。这是我们首次在滇池地区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的石寨山文化聚落！从最早的地层中浮选的种籽所做的测年表明，该地最早的时代为公元前14世纪，相当于商周时期，该遗址的文化堆积至少可以分为三期。

三、石寨山文化来源的探索

关于石寨山文化的来源问题，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尤其是云南考古学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为此，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特地设立了“滇文化起源”课题，期许在该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2011年和201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华宁小直坡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了包含石寨山文化在内的竖穴土坑墓536座。其中，石寨山文化墓葬435座，另外92座墓葬文化面貌和石寨山文化区别很大，将其命名为“小直坡文化”⁶。这类墓葬的特点是：“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极少数带二层台，有随葬器物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部和东部，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陶器和骨器数量少，不见玉石器，陶器出土时破碎严重。”

该组器物群的组合为双翼戈、铜镞、刻刀和铜凿等，陶器十分少见。这种遗存不是现在才发现，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滇南红河州的个旧市石榴坝墓地发现的。此后，在红河州的几个地点也有发现。2006—2008年，在澄江金莲山墓地的早期墓葬中也有发现。⁷2015年，在晋宁金沙山墓地的山顶部分，也发现有这类墓葬。⁸无论在随葬器物组合还是墓坑方面都与典型的石寨山文

化墓葬区别开来。金沙山墓地的墓坑规模很大、很深，建造相当规整，有的有木棺，单人葬为主，相当部分没有葬具。给人的印象是，墓坑很大很气派，但随葬品却相当稀少，不尽如人意。这类墓葬排列比较规整，很少有叠压打破关系，显示出墓地是有规划的。由于没有开展相关的年代测定，不知道这类墓葬的年代，我们认为应该与抚仙湖盆地的澄江金莲山墓地的早期遗存相同。这是我们首次在滇池盆地发现这类遗存。

我们现在尚难判断金沙山墓地山顶部分的以双翼戈为代表的遗存在年代上是否与上西河遗址最早期的遗存同期，但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线索——在滇池盆地的冲积平原地区，出现了公元前14世纪的遗存，这或许就是石寨山文化的源。

注释：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11年第1期。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晋宁小平山试掘简报》，载《考古》2009年第8期。
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澄江县学山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2010年第10期。
4. 资料现存澄江县文物管理所。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通海兴义遗址》，<http://www.ynkgs.cn/html/discover/20161104170831.htm>，2016年11月4日。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华宁小直坡墓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清理发掘简报》，载《考古》2011年第1期。
8. 资料现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东周至东汉时期的滇国

Outline of the Dian Kingdom

云南省博物馆 研究员 樊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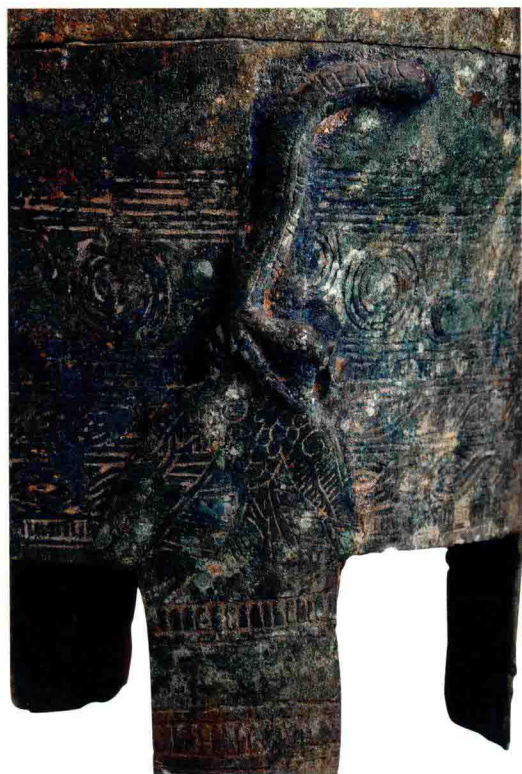
《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 221 年，秦吞并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首次“大一统”的局面。所谓“六王”，指的是韩、赵、魏、楚、燕、齐诸王，但自东周而下，“四夷”君长以什数，始皇帝虽囊括包举，吞舟之鱼亦难免有漏，云南的古“滇国”就属于这样的存在，它崛起于战国时期，直到东汉才消失在历史中。秦与滇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疏远。《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颉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司马迁此处用“略通”而非“开通”或其他词语来描述。秦二世而亡，五尺道长达两千余里的道路从勘测、选定路线到施工开通，显然不是十来年的时间就可一蹴而就的。可见云南虽偏隅西南，但秦帝国却始终未曾将之视为“徼外之地”。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秦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中央政府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分。这是云南正式纳入中国历史版图的最早的记载。

一、谁建立了滇国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云南早期的社会状况做过一些描述——“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但后世学者对于司马迁所记载的“庄蹻王滇”之事始终将信将疑。在云南出土的许多器物中，确实有部分楚风楚器的存在，但它们并不必然是“庄蹻王滇”的产物。楚青铜器的组合方式与滇青铜器之间的巨大鸿沟也确实存在。¹世所共知，楚国乃春秋、战国时南方第一大国，文化影响深远。汉文化就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汉高祖刘邦的老家沛县，在秦统一以前就属于楚国的版图。刘邦本人也是一个深得楚文化精髓的人，他的两首传世诗歌《大风歌》《鸿鹄歌》都是典型的楚歌，²所以我们不能在滇青铜文化中一见到楚风楚器，就认为与“庄蹻王滇”有关。滇青铜文化中出现的楚文化因素不一定就是从楚地来，即使从楚地来也不意味着必然是庄蹻所带来的。当然，从滇、楚青铜文化的差异推论“庄蹻王滇”的虚假也不够客观科学，毕竟目

前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庞大历史之一角，窥斑见豹非全豹，而且司马迁史笔如椽，这样重大的事件应该不是凭空想象，真相如何，真是扑朔迷离。

考古发现的滇青铜文化与楚文化分属不同的两种类型。³朱凤翰先生也曾认为“滇池类型青铜文化来源，一说即是楚将庄蹻带来的楚文化，或说是与四川巴蜀有关系，迄今尚无定论。但从滇池器物之造型、纹饰及组合等各方面看，实与楚器有一定差异，虽与巴蜀铜器有某些联系，但其地方特色很浓厚”。他强调滇青铜文化的“原生”性质，同时还指出昆明西山小邑村遗址出土的铜器“可能是滇池区域青铜器的早期类型”⁴。这是客观的认识。



战国 滇青铜器上的鸟衔蛇图案（局部）



战国 楚文化漆木虎座鸟架鼓上的鸟衔蛇图案（局部）

“庄蹻王滇”不仅是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一个考古课题，在史书的记载中因“层层累叠”而模糊不清，目前考古材料又无确切实证的情况下，对其真伪判断不应急于下结论。因为“先天不足”，解决“庄蹻王滇”真伪问题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庄蹻王滇”课题的研究反而不应该集中在“庄蹻王滇”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并已经得到考古学材料支撑的一系列子课题，最终的结论还要等考古新发现来证明。从目前滇青铜文化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楚人入滇，不可否认；庄蹻入滇，有待考证；而庄蹻王滇，可能性甚微。滇国及滇王，其主体应该还是土著民族。

滇国的强盛是战国晚期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氐羌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之下，偏居滇池一隅的稻作民族滇人也受到了滇西游牧民族劫掠的冲击。滇王族适时崛起，吸收了外来的先进文化，从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农牧兼备的民族，西汉时期，一统滇池周边乃至滇中地区，从而称王制霸。